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三十年見聞雜記

目錄

- 一 開場白……………四五一
- 二 記少年中國學會……………四五三
（一個與現代中國有密切關係的青年團體）
447
- 三 自『五四』以來……………四六一
（中國進入了一個動盪不寧的時代）
- 四 『五四』以後的中國出版界和教育界……………四七一
（附帶敘述我一點法遊觀感）

- 五 『九一八』以後……………四八三
 （這一節包括幾個有名人物的故事）
- 六 抗日準備時期……………四九三
 （附帶記錄了我二十五年東遊的感想）
- 七 抗戰的第一階段……………五〇五
 （這裡記錄了我當時在南京和武漢的見聞）
- 八 留在四川的八年……………五一五
- 九 記「民主政團同盟」與延安之遊……………五二九
 （這裡敘述了我與若干中共首腦人物的會見）
- 十 勝利以後……………五四五
 （我所見國共最後破裂的一幕）

我眼中的中國農林事業……………五五九

(略記我從事農林行政的一點經驗)

十二 結論……………五七一

附錄 清民之際的長沙……………五七三

(「近三十年見聞雜記」的一個補篇，記述我童年和青年時代的經歷)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一 開場白

從民國八年的「五四」，到三十八年由大陸退出，剛好是三十年。

這個短短的三十年，正是我由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投身社會，以迄今日的全部時間。

在這三十年中，消磨我時間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其次四川，其次南京，其次巴黎，其次武漢，其次香港，又其次是前年四個月的臺灣。

其餘因短期旅行而足跡所到之處，在國內的北方有青島，濟南，天津，北平，石家莊，太原，大同，延安，以及鄭州，徐州；在南方則江浙兩省的遊蹤較多，安徽，江西，福建，廣東的若干地點，我也到過。但西南一隅，我不會到過康，滇，黔，桂；西北不會到過甘，寧，青，新；正北一面，不會去過熱，察，綏；東北一角，則未出山海關一步。國外旅行過的地方更少，除西貢，新加坡，可倫坡，波峇因路過會登岸遊覽以外，僅日本有過兩星期的

勾留，也是我生平旅行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

我的出生地是湖南長沙，但我很慚愧，除長沙以外，湖南的任何地方我也不會去過。當我二十歲的那年，便已永別了我的故鄉，中間僅回去過兩次：第一次爲我的父母討了一個媳婦；第二次則因出國，送我的太太暫回娘家。在抗日初期，因爲政治中心移到了武漢，其時我任了國防參議會的一名參議員，隨後又參加了國民參政會。以湘鄂的交通方便，又會回長沙兩次，看見我童年時期的幾個同學，幾位本家和親戚。其時我已父母雙亡，一個簡單的家庭，留在淪陷的上海，兩個較大的兒子投入了空軍，當我離開武漢飛往重慶的時候，我是逍遙自在的孑然一身，也是我生平精神上最振奮最愉快的一個時代。

依據上面的敘述，可見我活動的空間甚爲有限，至於我個人這三十年的經歷，概括言之，不過是十年的編輯員，十年的教書匠，最後更混了十年的所謂政治生活。如果只就我個人身上取材，我這個幾萬字的雜記可能毫無精采，可是我紀載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了這三十年一切的見聞聞，却大可喚起大家一些有趣的回憶，因爲手邊缺少參考資料，一切內容，全憑記憶，關於某一事件發生的時間，容或偶有錯誤，但真實性却可相當保證，假如賜閱這個雜記的讀者，發現有不對的地方，而肯加以指正，我當然非常感謝。

二 記少年中國學會

(一個與現代中國政治有密切關係的青年團體)

在最近這三十年中，我曾加入並且還賣過相當氣力的團體，一共只有三個：一、少年中國學會，二、中國青年黨，三、民主政團同盟。這三個團體是一貫相生的，換言之，無學會即無青年黨，沒有黨，我當然不會參加什麼政團同盟了。

「少年」發起於民國七年，在這個學會發起以前，曾琦寫過一本「國體與青年」，首先在上海的「救國日報」發表，隨後由王光新在北京替他印成了一本小冊。曾琦寫這本書的動機，大概是因為經過了民五袁世凱的稱帝，民六張勳的復辟，民四日本既有二十一條的提出，民國六七年之交，段祺瑞秉政的時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畧，更是一天緊似一天，他和他的「羣」留學日本的朋友，也就正是在這個時期罷學歸國。一方面他深深感到國體發生了動搖，

同時外患又是如此的緊迫，因此他把民國締造如何如何艱難，一班革命先烈如何如何純潔，當前的國勢又是如何如何的危險，用他那枝流暢的文筆，在這本書裏說了一個痛快，無非想激發一般青年一點愛護『中華民國』的熱忱，大家起來同謀國事的補救，用意是很純潔而正當的。會琦在留學日本以前，我和他在上海的震旦大學同過一時期的學，大概知道他的爲人：他讀過不少的中國書，舊詩文頗有根柢，在他以前一般維新革命的仁人志士，也給了他很大的影響，因此把他造成了中國歷史上隨時「以天下爲己任」那一類的一個典型人物。我和他同學的期間，因爲彼此常有接觸的機會，我在他的眼中，也許覺得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因此在他和王光祈，陳愚生（原名瀆），張尚齡（即張夢九），周無（太玄），李大釗（守常），雷寶善幾位發起『少中』不久，便把我也就拉入這個學會了。這大概是民國七年底或八年初的事，其時我正在南京教書，後來有不少東南大學，金陵大學，以及河海工程學校的優秀分子加入了這個學會，便是由於我的關係居多。

「少中」發起的動機既如上面所述，好像一開始政治意義便相當濃厚，可是一看它的宗旨和信條却又不然。「少中」的宗旨很簡單：『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信條更只有八個大字：「奮鬥，實踐，堅忍，儉樸。」約束既是如此疏闊而輕鬆，

因此對於會員的思想和行動，確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束縛，除掉友情的交流，知識的交換，事業的互助以外，在最初幾年「少中」的會員間，實在沒有給我留下半點不良的印象，這與我後來所過的黨人生活，和政治上一切鉤心鬥角的把戲，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

「少中」以民七成立，經過了民八的五四運動，便一天天的擴大起來。因為「五四」一幕，有不少的「新少年」應運而生，而各地的青年組織，也有如風起雲湧，「少中」既已有相當的歷史，而「少年中國」月刊出版，也頗能予人一種清新的印象，因之由各地會員的展轉介紹，加入的乃逐漸加多。可是因為對會員資格的審查相當嚴格，一直到十二三年學會無形瓦解為止，據我的統計，也不過一百零八人而已。現在我手邊沒有這本會員名冊，單憑我的記憶所及，却只能寫出八十名左右，恕我不願把這個不完全的名單在這裏公布了。

從民七到民九的年底，這兩年多的「少中」會務，可以說是由王光祈一人主辦，關於會務報告的印行和少年中國月刊的出版，大抵都是出於光祈的規劃。光祈這個人的長處甚多：辦事負責任而有條理，待朋友充滿熱情，求知甚切，而表現力也很強，我從沒有見過他一篇模糊不清的文字，也從沒有見過他一次拖泥帶水的行爲，我自從認識他一直到他在德國因殉學而死，前後經過十五六年的時間，雖說我後來有十三年不會和他見面，但我卻沒有一個時

候不受他精神的支配。

可是光祈畢竟是五四時代的一個青年，他的祖父是四川一位有名的詩人，他自己的詩也做得不壞，因此在他的思想和行爲上，到底還是帶着幾分的浪漫色彩。我現在還完全記得：正是民國九年的一個冬天，我在南京寓所一間斗室中的油燈下看書，忽然聽得敲門聲甚急，我開門一看，只見光祈，同時在漆黑的天空下，我還看見兩隻發光的眼睛從光祈的身後，一直射到我這邊來，我於是連忙請他們兩位入內，在燈光下一看，知道另一位是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小姐，操純淨四川的口音，身材窈窕，舉止大方，我當下心裏完全明白，便顧左右而言他，問光祈出國的行期已否確定。他告我正是爲了出國的準備而來。轉問我能不能同他們一陣到上海去。其時我正接受了上海中華書局編輯的聘約，也正要動身，得此良伴，當然分外的高興。兩天後，我和光祈同到滬寧車站，他原約定那位北京同來的小姐在車站候他，不想她早已搭上光一班的火車走了！這一下真把光祈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雖然只好勉強上車，但總覺得這位從來不會到過上海的年輕小姐，可能遭遇什麼不幸，我越是說一位漂亮小姐總會有的辦法，他便越是懷疑，加上這一天又是一個淒風苦雨的冬天，雪珠打在車窗上叮叮作響。我們這兩個少年中國的少年，瑟瑟縮縮的坐在三等車廂裏，各想各的心事，一會兒談得興

高采烈，覺得天下事大有可爲；一會兒又憂來無端，萬念灰冷；心裏越是着急，車子走得越慢，好容易挨過七八個鐘頭，才到達上海的北站。當我們住進一品香旅館還不到二十分鐘，一個四川女子口音的電話，便來自遠東飯店，原來光祈之必住一品香，是早已和那位小姐約定的。於是一天的愁雲慘霧完全吹散，光祈又依然恢復了他那飛動活潑的神情，戀愛對於一個青年人本來有這樣大的魔力，我是半點也不奇怪的。

光祈留在上海，大致有兩三個月，在這一期間，他把申報駐德特約通信員的工作接洽好了，我便進了中華書局。同在這個時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便是我和光祈同往中國公學與梁任公先生作了第一次的見面，也是最後一次的見面，我們同樣讀過梁先生的文字二十年，對這位維新老鬥士的印象當然是很深，其時任公雖還不到五十，已累累有幾分衰態，但聽他兩小時的講演，精神却是很好的。

關於光祈的留學計劃，我完全不知，但我知道他沒有錢，因為如此，他便只好坐法國郵船的四等艙先行，那位四川小姐乃坐下一班的三等艙後走。等到這位小姐到達巴黎以後，光祈即從柏林前往歡迎，絕沒有想到她在來法的途中，已與另一位同船的王姓青年發生了不可分的關係，竟視光祈如路人！這一打擊非同小可，於是光祈乃一氣重返德國，經過一時期的

痛苦以後，始得恢復他一面讀書一面工作的正常生活。可是這與他後來專攻音樂，乃至留德十餘年不肯回來，不是沒有關係的。光祈在德的生活，一直是很忙很苦的，一面要爲申報，新聞報寫通信稿子，一面要上課，還要在圖書館看書，最後五六年，更寫了十幾本介紹西洋音樂的小冊子。（全部在中華書局出版）當他已取得音樂博士的學位以後，蔣先生接受我的提議，打電給駐德使館的參贊譚伯羽，問他何時可以歸國，願担任任何種工作，他不幸突患腦溢血的不治之症，斷送了他寶貴的生命於異域了。

一個人的一生中，能得着一個相互了解，相互信賴，而又真正可與共享的朋友，是太不容易的，假令光祈不死，我相信必定能領導我多有一點成就，也可能減少我一點過失。

自民十光祈去德以後，處理「少中」會務的責任，無形中已落到我的頭上。「少年中國」與「少年世界」兩種月刊，改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由我担任編輯。此外一方面因爲上海的交通便利，凡學會會員道出上海的，我總有和他們見面的機會；另一方面，則以會員出國留學的日子多，大致分往法德英美日等國者，前後不下三四十人，凡他們稿件的投遞，書籍的出版，報館通信的接洽，以及一切收欸匯欸的瑣務，也大抵由我一人代辦。現在回想起來，似乎是相當繁重，但以當時少年喜事的心情，同時受着一種誠摯友情的驅策，還是覺得津

津有味，樂此不疲。

從民八「五四」到十三年國民黨的改組，這個五年間是中國一個新政治醞釀的時期，同時也就是一個大混亂種因的時期。「少中」的宗旨本來是標榜「社會活動」而不願參加實際政治的，可是少年畢竟經不起時代潮流的鼓盪，於是到了十二二年，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學會的會員是否可以參加政治活動的問題，便在「少中」的會員間起了激烈的爭辯，在南京東南大學的棧園，在上海哈同路一七八九號我的住宅，都是他們集體的或個別的辯論場所，經過一年餘爭論的結果，事實上所得的結論，只是「各行其是」。於是會員中內李大釗，恽代英，鄧中夏（原名康），毛澤東，劉仁靜，張聞天，沈澤民，黃日葵，趙世炎，侯紹裘，楊賢江等等，便去攜他們的共產；曾琦，李璜，張夢九，何魯之，左舜生，余家菊，陳啓天，劉泗英（原名正江），魏嗣燮，趙會曉，棟登洛等等，便幹他們的國家主義；我記得有一次兩方面的分子約七八人，在我上海的住宅中辯論一個整天，臨別鄧中夏在門外向我握手說：「好，舜生，我們以後在疆場相見吧！」這大概要算是最後一次的破裂，現在回想起來，倒是頗有趣的。

還有幾點要在這一段中補叙一下：我和毛澤東第一次的見面，大概在十一二年上海安南

路民厚南里口一家商店的前樓，隨後又在民厚北里口小菜場邊擺過一回龍門陣，覺得他了無異人之處；二，學會有一位詩人康白情，後來跑到美國，隱射李鴻章，改名康洪章，居然聯合「少中」會員孟壽椿，康紀鴻等，發起了一個「新中國黨」，可是只曇花一現；三，加入國民黨的會員也有好幾位，在政治上演過一幕有聲有色的悲劇的，却只有一個周佛海。根據上面這個簡單的敘述，已可看出這個青年團體對最近三十年的政治關係爲何如了。

三 自五四以來

(中國進入了一個動盪不寧的時代)

人們對於五四運動的評價，因立場的不同，而有兩種相反的看法：有人以爲這是中國新思想，新文化，新政治的發端，有人則以爲這是近三十年來一切動亂的開始。其實說起來，却是兩者都對，也都不對。

就五四運動原來的意義說，僅僅只是一種青年的愛國運動，原因是由中國在巴黎和會遭受日本的壓迫，而英美法諸強也一味遷就日本，置中國對山東問題的意見於不顧，因此激怒了中國的青年，乃將歷來辦理對日外交的章宗祥痛打了一頓，曹汝霖的住宅被燒，同時要求將曹章及陸宗輿免職，結果北大及其他學校的學生被捕者三十餘人，風潮愈趨擴大，以致鬧到全國罷課，若干大都會罷市，政府與學生雙方相持不下，一直到六月三日上海也罷了市，

然後學生才得了完全的勝利：曹章陸一律罷免，學生無罪釋放。

本來只是這樣一件簡單的事實，但何以會牽涉到新思想，新文化，乃至對政治也生了絕大的影響呢？這便說來話長了。

原來中國的辛亥革命，僅僅只推翻了兩個滿清。革命的果實，却被一個專制餘孽的官僚袁世凱，以一種變戲法的手段收穫去了。民二倒袁不成，反爲袁氏所敗，因此所有的革命黨人，便只好重度他們的亡命生活，徐圖捲土重來。袁氏不能逆取順守，反而來一套復古的反動，對外更不惜重重屈辱，甚至連民四日本所提的二十一條，也大體接受了。民五的袁氏稱帝雖被撲滅，民六乃又有張勳的復辟，由這兩幕，更引出北洋軍閥在中國胡鬧了十年，這便是這一時期中國內部情況一個大致的輪廓。

國際的形勢怎樣呢？世界經過第一次的空前大戰，俄德兩大有名的帝國，都在這一期中垮了台；一個自命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在這一期中居然出現；日本乘歐戰混亂之際，列強無暇顧及遠東，乃施展渾水摸魚的手段，對我大肆侵畧，更藉口顛覆德國在遠東一個惟一的根據地青島，不惜一舉攘奪我國的山東。中國也算是一個參戰的國家，雖說沒有正式出兵，可是有十幾萬的華工在我們友邦的後方從事工作，即令不能令我們從勝利得着怎樣的好處，至

少總不應該對我們更加一種處罰。但列強爲了息事寧人，竟不惜與日本一鼻孔出氣，甚至連富有理想和正誼感的威爾遜總統，在和會中也表示對我們愛莫能助。這便是我們在這一期中從冷酷的國際間所遭遇到的屈辱。

內外情況的交通如此，剛好到了「五四」的前夕，胡適等提倡一種白話文運動，已漸漸到達了成熟的時期，這也可說是近三十年來一件第一等的大事。原來在胡適以前，中國有過不少的人提倡廢八股，但絕沒有人敢於主張廢古文，在維新與革命兩派中的宣傳家，有人懂得中國舊有的小說，戲劇，歌謠，彈詞等等，其體裁是一種有力的宣傳工具，例如梁啟超，便知道用白話寫「新中國未來記」去提倡他維新的主張；陳天華也懂得用白話寫「猛回頭」來鼓吹革命；可是這究竟只是少數人提倡提倡而已，既沒有理論上的充分發揮，也很少有人用全力向這方面去繼續工作，甚至他們的領袖人物如康有爲章炳麟等，都是到死還在寫古文，作舊詩，因此畢竟不能成爲一種風氣。清末有一位系統的介紹西洋思想的嚴復，一位大規模介紹西洋文學的林紆，但他們兩位都是古文家。吳汝綸爲嚴復序「天演論」，恭維嚴氏的譯文「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甚至連王國維讀嚴譯的「穆勒名學」也感到比讀穆勒的原著還要難懂；林自己不懂西文，但他所譯的小說却多至百七十餘種，在中國風行了近二十年

，可是究竟因爲文字的關係，即中國舊制的中學生，也未必人人都能暢讀。因此種種，在胡適以前，凡用文字來發抒情感，表達思想，或發表政治主張，只是少數士大夫階級的專利，與大多數的老百姓絕不相干。而所謂士大夫也者，又憑藉他們這點文字專賣品去勾結權貴，獻媚豪門，爲腐爛的統治階層「潤色鴻業」，以保持他們那個封建的殘壘，使民主制度無法在中國生得起根來，一直要等到白話文逐漸風行，這種情形才漸次改變。加以這個時候任北大校長的是蔡元培，他以翰林而參加革命，以一個舊學極有根柢的人而赴德留學，他對新舊學問有一套合理的看法，而於新舊之爭則不惜爲新者作有力的辯護，「五四」其所以能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發生絕大的影響，北大做了這個運動的大本營，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中國的思想界原有其相當的地位，儒墨無論矣，即法家亦不主張財富集中於少數私人，道家則有一種反統治階級的思想，尤爲激烈。清末外來思想輸入，社會主義一體系的思想，亦即挾之以俱來。記得四十年前我在高小讀書的時候，已經在長沙定王台圖書館見過這類的書籍，有一本姓趙的和一部用章炳麟名義譯的講社會主義的書，我都看過；而日本幸德水秋的那本「十九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的小冊子，則對我所留的印象更深。辛亥革命後，江亢虎印行了他的「洪水集」，並且發起了社會黨，似乎想由理想而形

成一種運動了。在光緒三十一年同盟會正式成立以前，孫中山已經在歐遊以後接受了社會主義，成爲他三民主義的一環，雖說後來他的同志在革命初期只側重「民族」而忽視了「民生」，但中山却是確有所見，持之甚力。中國因爲早已有這種思想的背景，因此對於社會主義的輸入，並不感到何等的新奇。可是使中國人接受這思想而見諸行動，則是一九一七年即民國六年俄國革命成功以後的事。

我在上文已提到，中國自辛亥以來以迄「五四」，雖說經過了一度的大革命，可是在各方面並無顯著的進步；因爲軍閥的割據與剝削，列強的侵畧有加，人民且更趨於窮困；國民黨以革命屢受頓挫，其勢也不能不另想辦法；剛好在這個時候忽有俄國革命的成功，「五四運動」又居然給予官僚軍閥以一種精神上的打擊；積是種種，顯然已在中國醞釀一種新機。以中山的銳敏，當然已看出了這樣一個徵兆，因之一面埋頭完成他自己理論的體系，一面更準備提出他繼續革命的具體主張。正當這個時候，蘇俄對內對外的形勢漸趨穩定，爲求自己進一步的安全，乃不能不向外擴大她赤化的影響。蘇俄領導者的手法是相當高明的：他們決定一面以公開外交方式博得中國多數人民的好感；一面另以地下的方法，從事煽動中國的赤化；在一九一九（民八）及一九二〇（民九）的兩年間，既先後以他們外交人民委員會代理

委員長加拉罕的名義，發表兩次對華宣言，表明願廢止帝俄時代與我國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並放棄所取得的一切權益；同時又不斷的派人勾結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青年，因之在民國八年至十一年之間，即先後在中國有「社會主義青年團」，「勞工協會秘書部」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而「中共」一經成立，即已加入第三國際而接受其指揮了。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中山與越飛在上海所發出的共同宣言，雖經雙方明白承認蘇俄的共產組織與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但這依然是表面的一套，實際則不是這麼一回事。蘇俄公式外交的進行，係就當時情勢分別向北京和東三省接洽，但爲蘇俄所特別注重的，却是中山所代表的這個力量。中山急於要取得國際的支援，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以完成國家的統一；一面又看見「中共」已在開始行動，而各地青年組織如學生聯合會之類，也確爲一股新興的活力；再加上十一年陳炯明的叛變，所給予他的刺激更深；因此他深切的感到國民黨有整理，加強，並輸入新血液的必要；此即十三年國民黨改組與「聯俄」「容共」一幕之所由來。當時國民黨內與黨外雖有人對這個政策表示懷疑，反對，但大勢所趨，命運所定，少數不同的意見，當然不能發生何等的影響。平心而論，以蘇俄當時那樣一副親善的面孔，加以她那種宣傳與組織的巧妙技術，以中山自身自民元以來逐漸形成的一種垂暮心情，又眼見一大羣熱情洋

盜的英英年少正在躍躍欲試，他除掉在預事防閑徐圖補救的前提下，來從事這一因勢利導的冒險工作以外，又還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呢？

在這一段的最後，還有幾件事和幾個人，應該在這裏加以補述。

所謂五四運動，我並沒有直接參與，在這個運動爆發的當時，我正在南京教書。我記得是在民八五月的下旬吧，忽然來了兩位北大的學生，一位是許德珩（楚儉），一位是黃日葵，他們好像是拿了王光祈的信來看我的，因為他們都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友。我問明來意，才知道他們是來運動罷課，並且想找一點其他方面的援助，因為這個時候被捕的學生還不會釋放，他們是想擴大風潮以促成政府的屈服的。他們對於南京人地生疏，我當即陪他們出去跑了一陣。第一個去看了當時江蘇督軍李純的一位幕僚白堅武，其次去找了一下其時駐在衡陽有名的第三師師長吳佩孚的駐甯代表某君，當時許黃究以何種因緣能去看這兩位，我完全不知。白堅武很像一個樣子，談吐態度，都不失一位漂亮幕僚的體統，對學生似乎深表同情；吳佩孚這位代表却很糟，我們是午後一點以前到達他那辦事處的，他還不會起床，我們坐了好一會，他才煙容滿面的走了出來。我已十分不耐，但許大砲（這是後來「少中」朋友加給楚儉的一個綽號）依然把來意陳述了一番，那位代表以一種官僚姿態答應轉電他們的師長

，然後才恭送如儀的把我們送了出來。

當天的晚上，我們會同了幾位東南大學的朋友同往金陵大學的宿舍去聚談，金大幾位「少中」朋友已經睡了，還是從床上拉了起來，一直談到深夜，結論是南京讀書的空氣頗濃，官方已有相當戒備，罷課怕不容易實現。我們走出金大，已經是十二點過了，滿街戒嚴，遠遠聽得軍警高呼口號，這一來倒使我們感到非常尷尬了！於是決定避去大衙不走，專走沒有軍警的冷巷。從鼓樓的金大到夫子廟附近的交通旅館是相當遠的，其時的南京又還沒有街燈，只好憑着我這個沒有十分把握的嚮導，領導着他們兩位在黑暗中亂竄！轉彎抹角，一直走了四五個鐘頭，終於找不着交通旅館的所在，幸而一家豆腐店已開門工作，上前一問，才知道旅館就在眼前，真是喜出望外。一天一晚的緊張工作，頗感疲勞，好好睡了一會，才又起來往昨天約定的幾處演說。演說的工作是由許黃兩位真代表担任，我這個冒充的代表只坐着傍聽，許大砲是聲容並茂，日葵也近於慷慨悲歌，可是在我聽來，他們演說的技術並不怎樣高妙。這件事是我生平接觸羣衆的破題兒第一遭，所以至今還留下了一個清晰的印象。許黃在南京奔走了三天，又到上海會同其他的代表繼續活動，居然鬧成了上海的「六三」罷市，所謂五四運動，才宣告勝利閉幕。日葵白晳面圓，西裝革履，是一個多血質的美男子，偶然

和朋友通信，也往往要寫得情致纏綿，和我的交情不壞，後來他加入了中共，已因病死去多年。楚僧在抗日期間和我在參政會共事，其少年意氣，似已非復當年，最近已向中共棄權，好像相當起勁，低回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民國十年一個春天的晚上，上海亞東圖書館的主人汪孟鄒約吃飯，到的都是當時幾個雜誌有關係的人物，我是和王光祈魏嗣鑾宗白華一陣去的，在那裏我第一次見着陳獨秀朱執信戴季陶。獨秀和光祈本來很熟，見面便笑光祈一到上海便變得十分的摩登，問他有了甚麼問題，光祈只好笑而不答，我覺得獨秀的感覺真是非常的銳敏。朱執信圓圓的面孔，兩撇小鬚鬚，勁氣內斂，出言有序，給我的印象最好。戴季陶穿一件琵琶肩的背心，三十四五的光景，民初張丹斧劊苦他「面如冠玉」，則已非其時。在桌上口講指畫，大談他交易所的得意之作，把我青年時期在民權報讀戴天仇文章的一些幻想，全部取銷。後來知道他在南京搞孝園，敲木魚，當院長，在方格柙裏而寫楷字，總覺得陰陽怪氣。抗戰中在公共場所儘有和他見面的機會，但我始終有計劃的保持着，沒有再和他談過半句話，一直到他在廣州自殺了，才回復了我一點對他的同情。

惲代英（子毅）和鄧中夏（原名康）加入「少中」都很早，但和我發生密切的交往，却

是我到了上海以後的事。他們兩位都是中共初期最賣力的人物，代英還帶三分做作，中夏則純任自然，大氣磅礴，假定他們兩位不死，不知比較今日的毛澤東劉少奇爲何如。我根本不是一個革命者，且根本不會對任何主義發生迷信，但他們兩位却對我下過工夫，還拉我在「嚮導」和「中國青年」上寫過文字。十四年中山死了，我曾有加入國民黨的衝動，但卒以找不到適當的介紹人作罷。稍後加入了青年黨，也只是一種朋友關係的偶然。在後面的幾段，可能有比較詳細的敘述。

四 「五四」以後的中國出版界

和教育界

（附帶敘述我一點法遊觀感）

我任上海中華書局的編輯，是民國九年冬天的事。我初進去的時候，在該所任職的不過八九十人，分作幾個部門，有中學教科，小學教科，兒童用書，英文，雜書，等等名目。中華書局創辦於民國元年，本來是以印教科書起家，因初期發展太快，民國五六年曾遭遇極大的困難，負債累累，幾至無法支持，一直到八九年之交，才逐漸恢復。這個時期，正值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也就是中國出版界進入一個繁榮時期的開始。中華爲適應需要，在編輯所另闢了一個「新書部」，我所擔任的職務，便屬於這一部門，最初，我上面有一位主任，戴姓，日本留學生，人很老實，我進去以後，他便樂得輕鬆，幾乎把這一部分的責任，全權

委托了我。不到兩個月，他另有高就，走了，於是這一部的主任，便名實都由我來擔任了。

新書部因爲是一個新闢的部門，對於工作方面，原無具體的規定，一切可以聽我自由計劃。老實說，我自己既無多大把握，書局方面更沒有若何成見。其時我雖然已有了一羣朋友，但因爲我對他們懷有更大的期待，並不希望他們在一種半成熟的狀態之下，便輕於從事翻譯或著作。可是我除掉乞靈於這班朋友，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因此，我還是發出了三四十封徵求稿件的專緘，並請他們介紹宜於從事這類工作的其他朋友。大致不出兩個月吧，我便從國內外收到了不少的回信，約定的稿件已有十幾種之多，於是我便大吹大擂在上海各報發出了一個所謂新書的出版預告！這個廣告激動了一位多年從事譯著的老將馬君武先生，他很高興的把他兩部早已講好的稿子寄了來，其一爲「達爾文物種原始」，其一爲「赫克爾一元哲學」，聲明願意參加在我們這一套新書裏面出版，並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這實在鼓起了我不少的勇氣。

其時我在南北兩高師還有不少研究教育的朋友，我平日已在各種刊物上，看過他們許多關於中國教育方面的意見。中華書局本來出版得有一種「中華教育界」月刊，可是不能按期出版，內容也畧嫌陳舊，且太不充實。於是我向書局的總經理陸費伯鴻（逵）和總編輯戴懋

哉（克敦）進言，請他們把這種月刊也交給我，我保證內容可以革新，並可如期出版。經過他們兩位欣然同意，因此我又兼任了這本「教育界」的編輯。我編輯這本雜誌大致有三四年，不止一班青年教育學者的稿子被我拉了來，乃至他們一班先生的稿子也被我拉來了不少。其時中國的教育正在欣欣向榮，經過杜威來華一度的講學，更增加了不少的生氣。我對於這種表面的蓬勃氣象，自然也相當樂觀，可是我因為興趣和職務的關係，不能不從多方面去接觸他們這一羣人，也強迫着我去讀他們的著作和理解他們的意見，因此也就隱隱的引起了我一種憂慮：我覺得他們對於外來的教育制度，思想和方法，只是忙於接受而缺乏批評，過重形式而內容貧乏，尤其對中國所固有的教育制度，思想和方法，也太少融會。我的腦子裏並沒有張之洞以來的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也沒有陳立夫們所提倡的所謂「中國本位文化」，但五四以後陳獨秀等所主張的賽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學與民主」這一趨向，我却至今還是承認不錯，同時我也決然反對把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一筆勾銷。根據我這個觀念去看五四以至抗日以前的中國教育，果然算得盡了發揚科學與民主的職責嗎？不錯，多少是有的；可是由它所發生的力量，能制止或沖淡後來從政治上所產生一切反科學與反民主的邪魔外道嗎？如何把這個形勢從根本上扭轉過來，這便是今日最嚴重最基本的問題之一。

話說到題外去了，還是回到本題罷。新書部的出書逐漸加多，雜誌除自編的「教育界」一種以外，後來外面委托書局出版的雜誌，如梁任公張君勳張東蓀俞頌華等有關的「改造」，北高師的「教育叢刊」，張耀翔編輯的「心理」，劉伯明（經庶）吳雨生（宓）梅光迪（覲莊）等有關的「學術」等六七種，也全部交由新書部處理。我這個時候做事的精神是一味貪多，可是究竟感到人手不够，於是只好再找朋友幫忙，例如現在頗知名的人物如田漢，張聞天，陳啓天，李達等等，我都委屈了他們到這個小小的新書部裏和我共過一時期的事。

我現在回想起來，從五四前後，一直到抗日的戰爭爆發以前，這個十五六年之間，實在是中國出版界的黃金時代。所出版的書，方面一天天趨於複雜，量固然加多，質也提高了不少；不但新書可以暢銷，便是綫裝書也隨着一般人求知慾的亢進，忽然風靡一世；例如商務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華的「四部備要」，乃至「圖書集成」，不待出版，預約的即已不少。幾家大書店的情形固然如此，較小的如開明，北新，生活，亞東以及後來新興的若干小書店，也無不以競出新書相號召，而且各有各的特色。假定後來不有圖書雜誌審查一類的背時辦法，又不遇着八年抗戰的傾挫，一切聽其自由發展下去，其成績當然更有可觀。可是話又說回頭，今日中國整個的文化，已全面的進入了一個被摧毀的時期，其

結果令人不忍想像，區區一個短時期中所積累的一點點成績，又值得怎樣的去懷念呢？

在我把五四以來的中國教育界和出版界作了一個簡單的述以後，我想把中華書局的總經理，同時也就是該書局創辦人的桐鄉陸費伯鴻先生，作爲當時主持中國出版事業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來談一談。

伯鴻早年曾參與過革命，一度加入劉敬安等所組織的武昌日知會。在辛亥以前，他便在武昌察院坡經營了一家小規模的書店。後入商務印書館，從事小學教科書的編撰，並會任「教育雜誌」的編輯。民元中華成立，即以出版教科書與商務競爭甚烈，幾乎凡有商務之處，即無一不有中華，一時全國中小學所用的教科書，差不多爲這兩家書店所包辦。伯鴻的學識，我不完全明白，但我知道他治事極勤，頗有「狄克推多」的氣概；頭腦非常清楚，具有豐富的常識，歡喜看書，對文學有相當素養；性情爽快，雖自信甚強，任人則甚專；我和他共事十年，我固然沒有麻煩過他，他也不會麻煩過我，因此相處得非常融洽。到民國二十年，我在復旦兼得有課，同時對青年黨也負了部分的責任，實在感到相當的疲勞；加以坐得太久，也未嘗不想走動走動；因此我向書局提出辭職。伯鴻似乎很難過，一再加以挽留，並力勸我不要幹政治，認爲於我的性格不合。後來看見我非走不可，又對我說：「假如你幹政治覺得

厭倦了，希望以你的同鄉范靜生先生（源濂）爲例，依然回到書局來。」我覺得他這個意思是很可感的。抗戰既起，政府有國民參政會的設立，伯鴻也應聘任了一名參政員，曾兩度由香港飛重慶出席，我又有機會和他盤桓了一個時期，其時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不久便死了。我記得某屆參政會在開幕後舉行了一個追悼會，同時被追悼的是西南聯大教授羅文幹，大公報總主筆張季鸞和伯鴻，他們都不到六十，同在抗戰中死去，實在是很可惜的。

我在民國十五年的秋天，有機會出國遊歷一趟，這也是伯鴻的好意，由書局送了我三千元，否則我是絕對沒有這個力量的。於是我把妻子寄住在湖南的岳家，老父母則在南京，暫由兩個哥哥負責。出國時的心情不怎樣愉快，但我究竟還只有三十二歲的年紀，勇氣却是十足的。三千元包括來回的川資和製裝費，並且打算在法國至少住一年，寬裕自然談不上，可是我看見許多勤工儉學生，手上只有一二百元便敢於冒險出國，因此也就沒有什麼恐懼。

大概在我十六七歲懂得自動看書的時候起，對於西洋文化便不勝其嚮往；可是前後在上海住了八年，眼見那些洋鬼子的所行所爲，却又引起了無限的懷疑。一直等我跳上了法國郵船，我才有了一種接觸西洋文化的實感；過去在震旦讀過三年的法文，也是上船以後，才感到大有用處。

船在沿途的香港，西貢，新加坡，可倫坡，波賽停靠，我總是借着我同房的袁君一陣上岸去遊覽的。眼見英法對殖民地經營種種，不勝感喟；回顧國內各方的情況，在許多方面，乃至並此類殖民地而不如，又爽然若失。當時我會將沿途的見聞，用通信方式寄交「蘆獅週報」發表，我記得從表面上所得的印象，總覺得英國人的能力較強，以香港新加坡與西貢的堤岸一帶比較，也覺得前者較為清潔整齊，富有生氣，而在英殖民地一般中國人的生活，也究竟比安南人似乎要好些。但這畢竟是走馬看花得來的一種直覺，到現在，我以為這類比較根本也就是多餘的。

在紅海受過了我生平不會受過的熱，過波賽轉入地中海才感到一派的秋意，昏昏的頭腦，又清醒了過來。我記得是八月十四的一個清晨，我們的船到達了法國的南方大港馬賽，正下着濛濛小雨，着秋服已覺稍涼，臨時加上一件大衣，才和袁君一陣登岸。留馬賽一天，法國給我的最初印象不算太好：碼頭和街道都不怎樣清潔；海關人員毫不熱心檢查，對十個佛郎却相當滿意；兩人五件行李，由碼頭運到車站，被搬夫敲去一千三百佛郎，而且面孔並不好看；只有一家義大利餐館的一頓午餐是不錯的。

由馬賽去巴黎坐的頭等臥車，車上的一切一切，與京滬路彷彿，惟速度過之，但回溯我